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8 期 总第 48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1 年第 8 期 · 总第 48 期

热点观察

详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2 年怎么“稳字当头”？	1
入世 20 周年中国从“融入”到“引领”？	3
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6
国企数字化转型跑出“加速度”	8

学科前沿

加强政府监管，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10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年回顾与展望	13
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理与路	15
拓展管控海外利益能力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17

经管资讯

未来全球产业链发展将呈现三大特征	20
从 2020 年职工平均工资看经济发展潜力	21
量稳质升 外贸创新高	22

详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2 年怎么 “稳字当头”？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但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当然，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会议除了对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开放、区域、社会七方面政策进行部署外，还就共同富裕、资本、初级产品供应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五方面问题进行着重阐述。

1 稳字当头：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肯定2021年经济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首次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要求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8%，全年有望实现8%左右的增速，能超额完成年初6%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将高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但是，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较高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稳健供应链带来的出口替代效应，国内消费和投资相对疲弱。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4.9%，在散发疫情、大宗商品高位运行、煤电紧张、房地产调控收紧、汽车缺芯等多重冲击下，经济增速呈现加速下行的态势。这也影响着市场对2022年的预期。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财政政策总体偏紧，专项债效果并不明显，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很低，消费总体偏弱、投资低于预期。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全年预计增速在5%-5.5%左右，需要宏观政策加大力度。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明年疫情的影响可能并不能完全消除，外部环境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大家普遍预计明年进出口增速会回落，但回落到什么程度事先难以准确估计。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在5%左右，可能略高于5%。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明明表示，明年最大的利好就是稳增长政策会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赤字率至少不应

低于今年（3.2%），要拉动有效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应尽快出台一些涉及国计民生、中长期的重大项目。货币政策要尽快刺激信贷增长，可考虑降低 LPR，降低贷款利率，对中小微、制造业、三农等加大支持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考虑到宏观政策会加大力度，预计 2022 年中国经济能实现 5.5% 的增长。由于明年外需出现一些波动是大概率事件，需要提升扩内需力度，来对冲外部波动，稳住经济基本盘。消费的提振有短期政策，也有中长期政策。短期政策包括消费券、促进汽车消费等。明年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发展长租市场等，也会对扩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落实共同富裕行动纲领，补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2 沉着应对百年变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就微观、结构、科技、改革开放、区域、社会等其他方面政策进行部署。比如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结合，继续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吸引更多跨国公司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2022 年，我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述七方面政策均属“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更要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内部的确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刘元春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有观点认为，疫情结束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恢复正常，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乐观。欧美对中国的围堵，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重视，未来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的高度。我们当前因为疫情获得的供应链红利，所带来的外资外贸繁荣，其可持续性很差。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推动“十四五”规划真正落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预计 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 5.2% 左右，这是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 5 时代。这七方面政策都是围绕“稳字当头”展开，很核心的在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国经济过往的循环是房地产、金融循环较多，未来要打造科技、产业和金融良性循环，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供给能力的关键。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今年可以继续推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货币政策方面也可以通过结构性政策对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给予支持。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是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这能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进而提振消费，拉动国内大循环。会议指出，扩大高水平开放，多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要有效应对全球产业出现的分散化、多元化、地区化、本土化趋势，降低芯片短缺、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国际海运运力紧张等问题对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的影响。一是集中力量强基础补短板，加快对关键领域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研发，防止关键领域断裂风险。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固优势、促协同，进入产业集群发展，巩固产业链。三是扩大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力度，落实好 RCEP 协议以及参与 CPTPP 等框架的合作，

共享中国大市场产业升级的红利。

3 稳预期：明确五大关键点

会议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比如关于共同富裕，会议指出，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关于资本，会议指出，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关于防风险，要求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等各方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关于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科学考核，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防止简单层层分解。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宏观政策研究室主任冯煦明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部分领域原本隐藏在水面之下的风险可能加速暴露，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稳字当头。个别房企债务风险暴露，有关部门正在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妥善处置，与此同时应审慎做好稳房价、稳预期工作，避免房地产行业硬着陆。罗志恒表示，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肯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的积极贡献，有助于稳定微观主体预期与信心，设置“红绿灯”意在强调资本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资本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要避免出现拉闸限电式运动式减碳。实现双碳目标，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要遵循中央所强调的“先立后破”，只有在绿色技术支撑下形成了新的供给能力，在确保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能源的平稳转换。要创造一个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微观基础，双碳目标的实现应允许各地区、企业有较大自选动作，鼓励他们去探索可实现的路径。

作者：周潇泉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1 年 12 月 13 日第 002 版

入世 20 周年

中国从“融入”到“引领”？

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开始真正腾飞。2020 年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为 17%，而 2001 年仅为 4%。

1 入世二十年：中国与世界共赢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20 年间，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断扩大开放，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入世不仅让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成就，也为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主体带来巨大机遇。站在新的起点，中国将迈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并与世界一道开辟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未来。12 月 16 日，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面向未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纪念中国入世 20 周年”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京举行。来自政商学界的 4000 余名代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

“中国加入 WTO 是贸易谈判互利双赢的经典案例。”WTO 前副总干事易小准指出，一方面，入世让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也让中国走上全球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的加入标志着 WTO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贸易组织，也使得经济全球化全面提速，“经济全球化的高潮就是中国入世”。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指出，自 2002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 30%，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成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截至 2020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超过 9.2 万亿美元，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接近 1400 亿美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加入 WTO 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的事件，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入世之后，中国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参与全球分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同时，对新中国来说，入世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牢固树立对外开放的理念，坚持扩大开放不动摇。“入世”让中国和世界分享红利入世之后，中国经济开始真正腾飞。2020 年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为 17%，而 2001 年仅为 4%。高燕指出，2001 年至 2020 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一位，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数据显示，2001 年，我国出口金额占全球的比重仅为 3.8%，2020 年，我国出口金额占全球比重提升至 15.8%，稳居全球第一。2001 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仅为 468 亿美元，2020 年增至 1443 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从 2001 年的 69 亿美元，增至 2020 年 1573 亿美元。高燕指出，加入 WTO 后，中国从政府到企业，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中不断学习规则、熟悉规则、运用规则，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旁观者、跟随者转变成为参与者、建设者。

回顾入世前的情景，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王旭升说，“外贸企业当年是专营的，在经营权下放之前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就是‘五大进口’和‘五大出口’，经营权开放之后，这些企业都面临如何生存、如何转变轨道的紧迫任务。”该集团成立于 1998 年，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在 6 家原外经贸部直属企业基础上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王旭升说，集团的组建就是为了适应市场开放、下放经营权的大趋势，解决传统的国家窗口贸易公司的长远发展问题。“作为外经贸领域的‘国家队’，通用技术集团不仅是中国加入 WTO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入世后各领域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在入世之后，通用技术集团充分利用互惠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等 WTO 规则，创新技术引进方式，提出了关键技术装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策略，加速推动我国关键领域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进程。据介绍，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燃气轮机发电站项目、高铁动车组等重大技术装备采购谈判都是由该集团组织进行的，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2 中国已全部兑现“入世”承诺

中国是否充分履行了入世承诺？这是一些西方政客反复提出的问题。10月28日，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两份文件规定了中国加入WTO之后需要履行的义务，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对照这个时间表，中国已经完全履行了WTO规定的义务。对于这个问题，不仅经历了入世谈判还在WTO工作8年之久的易小准说，自1995年以来，除了新加入的成员，大多数WTO成员在开放市场上都是原地踏步，而中国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超过了之前所有的WTO成员。比如，现在中国农产品实施税率为13.8%，比当年对WTO承诺的15.8%降了2个百分点；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农产品关税是56%，发达国家成员为39%。易小准强调，中国不仅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自主单方面开放。比如，目前，WTO的平均约束关税高达45.5%，中国入世时承诺货物关税要降到9.8%，但现在进口关税总水平已经降到了7.4%。根据WTO的统计，中国贸易加权的关税已经低到了3.4%，非常接近美欧的水平。不仅如此，中国在入世时还大幅开放了服务业市场。回顾当年的情景，易小准说，在入世前，服务业还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短板，但中国国家领导人把这挑战当作改革开放的机遇，还是果断地决定要开放。最终，中国在WTO中承诺开放的服务业的分部门高达100个，包括金融、保险、证券和电信等对中国最为敏感的领域。相比中国的开放水平，WTO原有成员迄今承诺开放的服务业分部门平均还不足50个。“自WTO于1995年成立以来，共有3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加入，但能像中国一样取得如此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并不多。”WTO副总干事张向晨说道。在他看来，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现扩大市场准入和遵守国际通行经贸规则的有机结合。

3 如何看待WTO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张向晨指出，WTO规则大多形成于上个世纪。在过去20年里，WTO力推的多哈回合谈判没能取得成功。国际社会对WTO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大，指责其没能对发展、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问题做出应有的回应。WTO原有的一些运作机制也被搁浅，比如用于解决贸易争端的上诉机构。张向晨认为，WTO的现实困境源于逆全球化潮流。他说，“这股潮流根本上是由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衡造成的。发达国家总体受益多，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感到自己收获甚微，甚至一无所获。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群体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却未明显改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很多国家政府未能及时出台有效的国内政策措施来化解这些矛盾冲突。”尽管如此，张向晨强调，逆全球化的“回头浪”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的浩荡主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符合各国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的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反全球化逆流有一个相互冲撞、此消彼长的过程。“今后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仍将处于艰难时刻。但只要各方经过反思和探索，该进程将被逐步重新激活。”张向晨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是对WTO的压力测试，也相当于一场破坏性试验。“过去几年，WTO确实受到重创，并暴露出一些体制性缺陷。但同时也证明，WTO的现有成果和核心价值弥足珍贵。其规则框架，为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随着全球化的推进，WTO必会重现其价值，焕发新的生机。”

4 中国应如何更加有效地参加WTO

张向晨指出，中国加入WTO后，顺利完成了由规则学习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变。过去20年，除了履行承诺，中国也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建设性作用。比如，2015年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是WTO在本世纪达成的第一份关于取消关税的重要

协议，中国不仅是重要参加方，也是最大贡献方。但与此同时，张向晨指出，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去年 GDP 突破 100 万亿元，别人不会再用 40 年前或 20 年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不管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对中国贡献的期望值均与日俱增。“如何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多边贸易体制多做贡献，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一场新考验。为此，中国需要做出战略性思考。”中国在 WTO 改革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据中国驻 WTO 大使李成钢介绍，中国较早就对 WTO 改革进行了系统性的思考，早在 2018 年 7 月就与欧盟成立了中欧 WTO 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中国愿与其他成员合作，探索将诸边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更好地纳入 WTO 框架，推进 WTO 谈判功能，同时也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未来可能的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的讨论和谈判，继续改进、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使之更符合 164 个成员整体利益的需要。“对 WTO 改革既要有雄心，也要有耐心。WTO 改革牵涉面广，涉及利益多，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把握好世贸改革的方向和平衡，不能过载。”李成钢说道。他强调，在改革方向上，应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非歧视和开放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在改革顺序上，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危及 WTO 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特别是打破上诉机构僵局，让其恢复正常运转。在改革的界限上，应尊重成员各自发展的模式，不能将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列为改革议题。

作者：郑青亭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1 年 12 月 20 日第 008 版

以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数字经济关系国家发展大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应该构建何种关系？哪些产业能借力数字经济“换道超车”？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1 “换道超车”带来发展机遇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数字经济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有怎样的意义？

林毅夫：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换道超车”的机会，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具有研发周期短、技术迭代快的特点。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技术发展方面，中国有比较优势。一是数据优势。大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 21 世纪的“石油”，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有超 10 亿网民，产生了海量的

数据资源，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数据来源国。二是人才优势。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高智商、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绝对量高，因此在研发上有人才优势。三是市场优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中国有最齐全的产业配套，不仅是数据大国、人口大国，也是市场大国、应用场景大国，这些优势结合起来将是我们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不仅是能把消费、生产、服务过程中所创造的数据变成生产要素，从而提供新服务、新应用的新产业，而且可以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国产业大致可以分成五种类型，包括追赶型，如装备制造业中的大部分领域；领先型，如家电业、移动通信业中的一部分；转进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部分环节；“换道超车”型，如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战略型，如国防军工产业。对于这五种类型的产业来说，数字技术都有着重要意义。比如，汽车业是一个标准的追赶型产业，但汽车与数字结合后带来的无人驾驶等新技术，以及汽车业向服务业延伸，都是中国汽车业追赶的机会；目前领先的家电业，则可以利用数字化提升价值链，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可以说，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有望与其他发达国家齐头并进，用数字化缩短落后产业追赶周期，保持领先产业的优势，提升快要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发展数字经济是中国在新征程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很好机遇。

2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记者：“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请问，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靠的是什么？

林毅夫：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就要用好中国的比较优势。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中国在软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等领域有优势，要继续加强。在核心技术的硬件部分，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全球产业链背景下，不可能每个环节的比较优势都在中国，有比较优势的要用好，没有比较优势的要充分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正确看待中国没有比较优势的核心技术。数字经济技术更新换代很快，企业要取得核心技术需要大量研发投入，利润决定了研发投入总量，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因此，具有这些核心技术的企业一般都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如确实存在我们无法使用的核心技术，就要用新型举国体制去解决。中国要高质量发展，就要考虑成本和盈利，不可能自己研发所有的产品和技术，要保持对外开放。同时，要对其他产品和技术保持跟踪，了解世界发展，也了解自己的差距，并保持迅速克服差距的能力，但绝不能搞全部国产替代的自我封闭的发展道路。

记者：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遇到哪些瓶颈，应该如何突破？在这其中，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应该分别发挥什么作用？

林毅夫：数字经济是一个新产业，其应用场景还有待继续探索创新。目前，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发展较好，产业互联网发展还有待深入。在产业互联网方面，大企业进展较好，中小企业才刚开始。从规模经济角度来看，中小企业想要自己掌握这些技术的投入较高，因此要帮助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化改造提升竞争力，需要一些平台公司开发专门的技术来帮助中小企业，政府也要给予一定鼓励。数字经济建立在数据要素基础上，涉及海量个人信息。要注意合理使用及保护个人信息，避免利用数据形成的垄断等问题，一方面要鼓励支持国内更多平台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垄断反过来变成创新的障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大企业自身有积极性，投入能力也高，中小企业就需要政府支持。目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在服务业上进展较快，但在制造业上还有差距，需要针对不同产业特性提供相应的措施，克服法律法规滞后于产业发展等障碍。这其中，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有为政府是动态的，要根据数字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特性、数字经济

本身的特性，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特性不断调整政策，更好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3 融合才能拓展更大空间

记者：您认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应该构建一种怎样的关系？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哪些产业和行业将会抢占先机？

林毅夫：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应该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在融合过程中，消费服务业走在最前面。如腾讯、阿里、京东、拼多多等服务平台有很多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落后。原因在于，一是中国有较好的通讯、互联网网络基础；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并且较为集中；三是中国有发达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四是中国人工成本相对较低。在生产服务业方面，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因为生产服务业的附加值高，比如律师业、会计业，在智能化、数字化后能替代的人工成本价值很高，这更适合发达国家的国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还有提升空间。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为 39%，有的发达国家则超过 50%。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优势，可以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方面。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帮助中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也会实现提质增效发展。

作者：黄鑫

来源：《经济日报》2021 年 12 月 19 日第 001 版

国企数字化转型跑出“加速度”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千行百业都在紧抓时代机遇转型升级。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纷纷驶上数字化发展“快车道”。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日前发布《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路径与政策选择——分类改革视角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指出，从 2010 年起，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不断攀升，且在研发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国有企业占比最高。

1 把握机遇，加快智能化升级

哈电汽轮机公司对叶片分厂进行大规模智能设备升级和厂房改造，数字化系统应用让分厂管理更加简洁高效；中建科工集团实施数字化变革，推进管理手段升级，打造出四级大数据管理驾驶舱、智慧工地平台、智能制造工厂等；神华与国电合并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后，在数字化基础上推动传统业务体系全方位改造，通过智能化提升决策管理方面的一体化、科学化和信息化……近年来，国有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案例比比皆是。在数字经济大潮中，大批国有企业主动将“数字化”“智能化”融入生产、管理、营销、产业协作等各个方面，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理念，开启线上“云模式”，有效提高了运营效率，探索出新的产业发展机会。今年 2 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明确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方向、重点和举措。国务院国资委、工信部日前

签署《关于加快推进中央企业两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中央企业加快信息化工业化融合和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庆理工大学副教授王文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受到高度重视，国企数字化转型面临特殊的时代机遇。在“新基建”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以互联网创新发展为基础的新一代技术革命浪潮，将推动国企发展全面进入“智能化时代”。

2 科技赋能，带动高质量发展

最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仙葫经济开发区内，国企广西投资集团主导建设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火热推进。据悉，该产业园已初步形成以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吸引 50 多家企业入园。“数字化转型正不断通过科技赋能国有企业，对其生产绩效、组织运营、创新、竞争模式等产生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分析指出，国有企业率先推动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时代、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作为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混合体在新发展阶段承担特定使命、发挥特有优势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杨继东认为，国有企业肩负着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构成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同时，国有企业在推进数字化方面拥有充足持续的内外外部资源和多层次全流程的核心能力，为国有企业数字化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动力来源。专家指出，数字化转型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作为引领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将加速推进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培育、新模式扩散和新业态发展，发挥国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国企更广更深融入并完善全球供给体系，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3 弥补短板，提升核心竞争力

当前国有企业数字化仍面临新基建规划不成熟、数字化过程长期而艰巨、国有企业组织架构复杂等诸多共性和个性的问题。因此，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专家指出，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数字化认识不够充分。不少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还缺少一些长期规划，这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影响企业的长期绩效。杨继东认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考虑成本的前提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来说，在政策细节上，强调在技术、管理、数据和安全方面的具体推进和落实；在转型方向上，政策指导国企在产品、生产、用户和产业等多方位数字化；在赋能举措上，注重国企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数字产业和攻克关键技术等方面助力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国企改革深度融合的重要基石，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抓手。”王文涛建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发展模式、设计出科学有效的工业互联网发展机制，是转型期推动国企数字化发展的重点之一。《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着力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创新、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打造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样板等。众多国企正在加速推进相关部署。在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看来，企业数字化转型就是要通过整合企业内外外部资源，利用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围绕数据、业务流程、组织机构的互动创新，持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作者：李嘉宝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 年 12 月 20 日第 008 版

加强政府监管，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将一个方面的“明确”概括为：“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明确”，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市场方面说，就是要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重要内容。从政府方面说，就是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在处理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好的政府作用就是要“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监管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治理手段。虽然我们一直重视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管，但是政府监管的服务和发展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我们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好高标准市场体系，必须深化认识监管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1 认识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特征和使命

首先，我们要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战略、任务、特点来认识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特征和使命。

高标准市场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服务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 and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市场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基础性方面，只有具有高标准市场体系才能建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对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要求是，必须具有高标准的市场基础制度、高效率的要素市场配置机制、高质量的市场发展环境、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制度、高效能的市场监管机制。

高标准市场体系要畅通各方面循环，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要求就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就是要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堵点，要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并打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阻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高标准市场体系中的市场主体要充满活力，服务于让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于2001年从低收入阶段迈入中等收入阶段，至今已在中等收入阶段20年。受世界经济增速下滑、中美贸易摩擦日益严峻、国内增长动力转换尚未完全到位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否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只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破除市场体系中束缚微观主体活力的障碍，更好激发微观主体的

活力、创造力，才能更好释放民智民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高标准市场体系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保持高质量发展，才能克服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中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实体经济发展缺资金、缺人才和缺科技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高标准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努力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监管与市场相辅相成

其次，我们要深刻认识高标准市场体系下监管与市场的关系。

监管是政府履职的一项重要职能和重要方式，其本质就是行政规制。监管与市场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监管与市场的目的、作用、效果不同，但二者相互补充。监管与市场二者发挥作用的目的不同：市场追求的是效率和活力，市场的力量在于使资源都尽最大价值被有效配置；监管的目的是通过干预、改善市场功能，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防止出现各种危害市场秩序行为，保护市场主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市场的调节主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监管主要体现为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行为适当性审查，以及对违规行为的相关处罚等。二者的效果也不同。市场对经济的调节通过价值规律实现，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监管的效果则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挥出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管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凡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能够通过功能上的良性互补和效应的协同进行有机融合，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效结合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市场的缺陷需要政府监管加以弥补。一方面，市场本身的固有局限需要监管予以弥补。市场的局限表现为调节速度慢，调节成本高，调节程度有限，并且经常会有调节目标偏差；对于一些重要资源、特殊资源的配置往往会失灵；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竞争者会优胜劣汰，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进而会产生垄断，使经济失去活力。另一方面，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存在很多缺陷：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市场要素无法完全实现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石化、电信、电力、烟草、金融、铁路等领域还存在很多行政性垄断，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还存在很多违法经营现象，一些企业缺乏诚信，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危害公共安全，损害消费者权益和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市场主体数量的急剧增多也对监管带来挑战。针对市场的这些缺陷，应该发挥监管的作用。只有通过政府的监管、完善对市场运行的规制，才能克服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

政府监管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不一定全部都对市场带来好处，甚至会影响市场作用的发挥。这是因为，政府未必完全掌握市场信息，对市场运行规律未必完全了解；政府也不会有比消费者更多的手段和方法去了解产品的生产过程、工艺，去更好地监督产品的生产过程、保证产品的质量；政府也未必能够完全了解清楚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消费需求，所制定出来的政策也就未必完全符合市场实际，这就导致政府监管不一定能弥补市场失灵，甚至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近年来，虽然政府监管方式有了很大进步，但政府管得仍然过宽、过多，传统监管模式的弊端仍然存在，抑制了市场活力。

只有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加强政府监管，才能克服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的障碍、建成高标准市场体系。

监管与市场的理想关系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自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一直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我们注重监管，但也存在监管过度 and 监管不足的情况。监管与市场二者究竟如何正确分工、准确定位和相互配合，是一个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因发展水平而变动的问题，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就是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总之，正确处理市场与监管关系，就是要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本原则，确立“非全部的市场决定作用”总体调节方针，将市场对一般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功能良性互补、效应协同的经济调节体系。

3 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最后，我们要深刻认识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进程中市场监管部门的使命任务。要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必须通过加强和改进对市场的监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一要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完善市场规则，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通过监管，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有序的竞争规则，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二要营造能够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的营商环境，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要通过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营造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便利投资兴业，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要为政府和市场划定法治化的边界，将所有监管规则 and 标准公开，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国际间对营商环境的竞争更加激烈，要通过监管创新，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三要完善、贯彻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优化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加快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监管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要加大质量监督惩处力度，加大品牌培育力度，提升企业改善产品质量的积极性。要强化质量工作考核，探索质量工作督察制度，出台支持加强标准、计量、认证、商标、品牌、专利、检验检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持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质量层次 and 品牌影响力。要完善高质量发展指标考评体系，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and 压力，切实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四要建设有效、有为政府，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市场监管部门要准确把握市场监管工作定位 and 方向，将市场监管融入政府治理体系。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明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多部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and 综合协调职责，更好发挥其对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监管体系、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推进跨区域监管协同的领导作用。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推动监管理念变革 and 监管方式升级，加速推进市场监管治理体系 and 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课题“现代化经济体系下的市场和监管问题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孙文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来源：《社会科学报》2021 年 12 月 9 日第 003 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年回顾与展望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 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

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大意义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刻改变了我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使我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深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投资大国；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更好条件，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释放了经济发展潜力。

有力促进了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可以享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权利，更好享受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成果。这为我国创造了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经贸环境，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的信心明显增强。我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20 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二十六位上升到第一位。

实现了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15 年入关/入世谈判的过程，也是我国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正是因为不断深化改革，我们能够有效应对市场开放的冲击，并将开放的压力转化为市场活力和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全面遵守和执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着力构建并完善符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我国取消非关税壁垒，大幅度降低关税水平，关税总水平由 15.3% 降至 7.4%，低于 9.8% 的入世承诺，国内市场的竞争水平大大提高。可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一个经典案例。

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掀开了新的一页。20 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规则制定。积极参加多哈回合谈判，为《贸易便利化协定》《信息技术协定》扩容谈判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基本结束后，我国及时启动区域贸易安排。2000 年 11 月，我国倡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 2020 年底，我国已经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 个自贸协定。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 17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我国还积极参加 G20 等全球经济治理平台，提出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中国方案。我国在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个层次上致力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进一步完善了世界经济体系。没有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是极不完整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多边经贸规则覆盖面大大拓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完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连续多年达到 30% 左右。可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与启示

始终坚持党对开放事业的坚强领导，与时俱进完善开放战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党对开放事业的坚强领导。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克服障碍，达成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兑现承诺、深化改革，实现了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持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践行开放发展理念，坚持扩大开放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开放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开放不动摇，更加自信自觉地提高开放水平。

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坚持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高度尊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个别大国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对国际规则合意则遵守、不合意则践踏。这不仅破坏了多边规则，最终也会伤害世界经济和其自身。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展现大国担当，带头做多边经贸规则的遵守者、维护者、建设者，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改革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坚持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3 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

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国际格局深刻演变，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加速调整，规则主导权之争更加激烈。我国比较优势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同步推进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实现改革与开放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以放管服改革为重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经济循环。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加强引资引技引才，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增进中外利益融合，破解对我技术遏制和规则围堵，解决供应链“卡脖子”问题，增强产业链韧性，实现内外循环在更高水平上的相互促进。

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牢牢把握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形成我国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以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我国传统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整合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

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准确把握全球经济规则走向，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对外经贸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先行先试作用，积极推进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探索数据有序跨境流动的精准监管模式，及时总结经验、复制推广。

完善高效协调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制，有效维护海外利益。

培育良好国际经贸环境。大力培养高层次国际经贸人才，创新国际经贸理论与方法，增强议题设置能力、对外谈判能力、国际沟通能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定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共同推进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10 日第 009 版

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理与路

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力支点，是增强内生性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一流营商环境”。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加快法治化建设等方式，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对表社会热切盼望，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一，准确界定营商环境概念。营商环境概念在不同情境下的表述可能存在差异，但其本质应该高度凝练、聚焦且一致。如世界银行认为营商环境的考察对象是“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政府规制因素”，而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认为营商环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可见，在市场经济活动范畴内抓住“企业”“政府”“制度”等关键词成为理解营商环境的核心要义。然而近年来，对营商环境概念的解读有不断泛化的趋势。如“政府”的范畴除了被延伸到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及服务组织外，还被延伸到中介机构、第三方服务平台等市场化组织；而“制度”的范畴不仅被延伸到汇率稳定、关税削减、贸易配额等外部环境，还被延伸到订单获取、技术改造、员工培训等内部活动。营商环境除了涉及政治、经济、法治等因素外，社会、文化、生态、国际化等因素也有所相关，解构营商环境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实践需要准确界定营商环境概念。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需要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狭义与广义之分、领域与区域之别，对营商环境的特征、内涵、外延进行系统性解构，把市场因素归市场，把政府因素归政府，在基础概念上形成最广泛共识。

第二，客观认识营商环境作用。营商环境研究源起于微观经济活动与宏观经济发展间的理论“鸿沟”，其目的是通过解构并测度作用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因素来解释宏观经济发展。因此，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作用就是逐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及社会整体创造力，最终驱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近年来，部分研究者选择性忽视营商环境发挥作用的限制性条件，片面强调营商环境的作用；部分研究者刻意忽视营

商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相关性，反而将其“等同于”必然性。这显然偏离了理论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事实上，影响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众多，在要素禀赋不强、文化传统不优、政治环境不稳等前提下，即使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恐怕也难以驱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从作用机理的角度看，以营商环境内部的税收为例，尽管其对微观企业而言是一种成本，但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发展阶段，由此积聚并转化而成的全社会投资却可能会在宏观经济层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需要探索营商环境发挥作用的条件，考察在特定情境下的效力，促使其在微观与宏观、规模与效率、长期与短期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第三，灵活设计营商环境优化路径。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围绕体制机制因素开展顶层设计，也需要政府部门将改革创新的政策举措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然而近年来，随着各地区营商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不断增强，部分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也面临固化的难题。如部分地区的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在开办企业环节全面推行“一表填报、一网通办、一窗领取”等新模式，已经实现了第 2 页共 2 页“1 环节办理”“0.5 天内办结”“0 成本支出”的目标。由于该目标在现有条件下具有较高的饱和度，为了在优化营商环境量化维度上取得新的突破，需要因地制宜灵活设计营商环境优化路径。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需要增加地方在法治框架内探索原创性、差异化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明确相关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主体责任，用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方式巩固推广优化营商环境的成熟做法和典型经验，对各地区复制推广借鉴工作进行督促与检查。

第四，动态设置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以评促改、以评促优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各地区通过全面对标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具有区域特色的评价机制、统筹推进多层次与多部门评价试点部署，在“问题点”“光荣榜”“经验集”“政策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推动了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然而，部分地区在指标制定方面“求多不求精”“求全不求特”，构建了包含数十项一级指标、超百项二级指标在内的“完整体系”，并在近几次营商环境评价中一直沿用，未曾与时俱进进行更新与完善。部分地区过于偏重可量化的客观性指标体系，对市场主体的主观感受不够重视。部分地区被动删减没有相应事权的指标，忽视了营商环境本身的复杂性、结果的相对性、应用的局限性，从而沿用传统思路，误把评价当“考核”。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需要确定国际可比、标准统一、内容丰富、层次多元、主体多样、特色鲜明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适时进行动态增添与删减。要把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系统评价与专项评价相结合，灵活运用部门填报、企业访谈、数据挖掘等方式，科学完善营商环境评价方法。还要正确处理营商环境评价与政府绩效考核之间的关系，谨慎选择结果公布的方式、渠道与范围，切实把结果应用的初衷放到“促改”“促优”上。

第五，辩证看待营商环境评价结果。“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近年来我国各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目标，也是行动指南。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紧盯世界银行发布的有关营商环境的系列报告，将排名前列的经济体作为样板，从而开启了“对标”与“追赶”之路。然而，“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并非特指单一或少数国家（或地区），其所具有的地域分散性、演变动态性、系统内部性等复杂特征使得指标选择难以固化。如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尽管综合指标得分排名第一位的经济体是新西兰，但在子指标得分排名中，新西兰仅有开办企业、获得信贷子指标处于第一位，而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子指标得分排名第一位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阿联酋、卡塔尔、肯尼亚、巴林、新加坡、芬兰。相比之下，我国在世界营商环境综合指标得分中的排名已从 2012 年的第 91 位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31 位，其中，尽管获

得信贷、纳税子指标得分仍然较低，分别排名第 80 位、105 位，但执行合同、获得电力子指标的优势已较为突出，得分分别排名第 5 位、第 12 位。构建一流营商环境，需要开展跨国案例的动态跟踪与对比分析，既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对标，也从细节的角度寻找差距；既在引入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获得经验教训，也在改革创新突破的基础上输出“中国方案”。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构建一流营商环境，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需要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拖欠民营企业款项问题研究”（2020P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海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12 月 8 日第 003 版

拓展管控海外利益能力提升国家 经济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历史昭示，伴随大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对外经济联系、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工程建设、海外务工和劳务输出等为主要内容的外向经济将深入发展，国家的海外利益将迅速扩张，而且对于国际秩序、国际治理体系和规则的塑造能力也在加大，客观上要求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必须同步提升对国民经济和外向经济治理能力。

当前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入发展，“走出去”企业逐年增加，我国的海外利益持续高速增长。只有强化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建设，强化对海外资产的配置和调动能力、增强海外投资收益回收能力，才能为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保障提供坚实支撑。

1 学术界对于“海外利益”一词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一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是国内利益在境外的存续形态和新增长点。第二种观点认为，海外利益是指在国家主权有效管辖范围地域之外存在的本国利益。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社会认同、国际组织身份、国际制度主导权等过程性的非物质利益也属于海外利益。也有人认为，海外利益是主权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需求的一切权益和好处。

总而言之，当前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重要内涵，它包括海外投资、海外工程、海外劳务、海外无形资产等处于中国国家主权管辖权之外的资源，以及与中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国际资源和国际制度等一切内容，中国对其有相应的管辖权和利益回收权，应当切实加以保护。

2 海外利益急剧增长是我国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的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海外利益已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截至 2019 年 9 月末，我国海外资产高达 7.5 万亿美元，其中净资产 2.2 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 2020 年我国 GDP 的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十三左右。截至 2018 年末，已有 2.7 万家中国跨国企业在境外 188 个国家（地区）设立了 4.3 万家分支机构，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951.4 万人次。2018 年当年，我国共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49.2 万人，期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99.7 万人，而中国企业向境外东道国（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 594 亿美元，中国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建立了广泛的利益纽带。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3 个国家已投资设立了近 1.1 万家企业，累计直接投资 1794.7 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满足了东道国人民世代渴望解决的国家重大建设和发展需求。例如由我国投资 60%建设的中老铁路的通车，使在东南亚国家中受制于地理条件的唯一“陆锁国”成为“陆联国”，彻底突破了老挝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瓶颈。

3 保护海外利益是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着力点

由于当前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正在不断逼近、超越国外竞争对手，未来可能遭遇更强烈的打击，海外投资风险越来越大。一是国际经验显示，通常因政治因素而造成的跨国投资失败案例高达 25%。二是当前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政治阻挠事件，明显多于发展中国家。在 2014、2015 年，我国国企在海外签订投资高铁项目相关协议，由于接连受到政治干预被迫搁浅。只有强化保护海外利益才能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实力。长期以来，我们严重依赖战后形成的国际安全体系，维护和保全海外利益除了受到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更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打压，严重制约着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可见必须加快海外利益管控和保护机制建设，有效应对经济防护、解决海外资产收益管理难题，注重权益保护和回收，还必须应对“长臂管辖”等种种新的现实问题。

4 通过建立保护海外利益机制，同步提升我国海外利益的管理能力

在当前中国的海外利益高度发展，海外利益支撑国家经济实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前提下，要求我们从国际税收、独立的国际清算结算体系建设、阻断外国“长臂管辖权”等、强化对外力量投送能力建设法制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保护、控制、调动、配置海外投资收益的体制和机制。

第一，不断改革和完善国际税收制度，强化税收征收能力。税收管辖权是主权国家具有排他性和独立性的税收主权，它体现的是国家对于具有管辖权资源的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中国作为跨国投资大国和在海外居住公民越来越多的大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全球资源和收入，应当全面通过对税收居民和法人的地域管辖权、居民管辖权和公民管辖权的行使，提升对海外收入的动员能力。美国和墨西哥在这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案例。在美国国际税制中，国家征税权力巨大。美国税务局（IRS）既对居民企业和个人来自本土的所得征税，也对来自境外的所得征税，同时还对长期旅居海外的本国公民的所得征税，较好弥补了税收漏洞，既保证了国家的财产权利，也加强了国家对于全球财力资源的调动能力和控制能力。今后我国国际税制建设的重点之一，既要完善和强化对海外投资的征税权，也要借鉴西方如何对长期旅居海外本国公民征税的做法，通过强化国际税收征管、签订国际税收协定、交换国别税收情报等措施，稳固和强化国家税收主权。近年来我国国家税务部门通过与 G20（二十国集团）、OECD（经合组织）等主要国家的合作协作，在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方面，通过共同参与 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体制机制建设，签订相互税收协定等，为我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抢得了先机，因此我加大对海外收益的保护和管控，也应当以此作为重要的典范和突破口。

第二，加快在海外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全球跨国资金管理调动能力。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推进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的加快，在主要投资东道国建设具有对我国海外利益进行管理、控制、运用、分配、调动的区域金融中心网络体系，并落实国家、企业以及经营人员在保护海外利益方面的职责和法律责任。在这方面，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体系，包括立法、行政法规和内部规章，涵盖和规范“走出去”金融企业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目标、战略、政策、措施，利益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动员的方式和操作细则，明确部门人员的行政责任和程序。

第三，完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法”，形成反制外国“长臂管辖”能力。欧盟在 1996 年出台了《免受第三国立法及由此产生行动之域外适用影响的保护法案》（即《欧盟阻断法》），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该法的核心机制包括：（1）明确了在欧盟境内，美国特定法律无效，美国法律的影响措施和司法文书不被认可和执行，进而从实体和程序上“阻断美国特定法律在欧盟境内的效力和执行”；（2）禁止欧盟相关实体遵守美国特定法律；（3）设定法律追索权。支持欧盟相关实体就美国特定法律对其带来的损失进行索赔。

2021 年初我国出台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从及时报告、评估确认、发布禁令、司法救济和处罚制度等 5 个方面，对外国次级制裁（“长臂管辖”）进行反制，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对于经评估确认、存在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形的外国法律与措施，可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与措施的禁令，充实了我国应对单边制裁或“长臂管辖”的能力。但该办法尚属临时规章，需尽快进行国家立法，并制定有关的实施办法和细则，通过财政预算、机构设置、人员和队伍配备落实有关措施。

在法制方面，一是要提升立法层次，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反制外国不当“长臂管辖”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具体实施的牵头机构，明确预算、部门职责、岗位编制、工作考核体制机制等。二是系统细化，尤其是对于工作机制需做到明确、透明和可操作。例如，明确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外国法律与措施的域外适用、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实体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形。三是建立迅速的对外执法发布机制，遇有中国企业按照本法向执法部门提起申诉，执法部门及第一时间以中英文向外发布。四是明确我国立法的严肃性。严格控制中国实体申请豁免中国法律，以体现本国法律优先于国际法的原则。法律应当明确对遵守中国政府禁令的实体遭受外国制裁损失进行法律救济的范围和政策力度。对于不遵守我国反制外国“长臂管辖”法律者，明确惩罚的刑责。

第四，注重外向力量建设，同步提升海外安保能力。完善《国家安全法》内容，继续通过海外保障基地建设，共享海外保障资源，稳固和提升未来海外利益保护等应急行动时期的动员潜力和能力。推进涉外民营安保产业发展，建设拥有国际视野和海外运营能力的安保队伍。

第五，积极和持续强化对外合作交流，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性的认同能力。首先把“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沿线国家和地区当作施策重点，在辅导企业提升海外投资和管理能力的同时，帮助“走出去”企业充分了解投资东道国的法律体系、文化习俗、民族特点、语言文字、饮食习惯等，注重与东道国社区、工会等非政府组织打好交道。（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间成果之一）

作者：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21 年 12 月 13 日第 A12 版

未来全球产业链发展将呈现三大特征

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安全问题广受关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承办的 2022 年《经济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蓝皮书》详细分析了疫情下全球产业链的调整方向和呈现的新特征。

在《蓝皮书》看来，跨国企业通过两大支柱来重新塑造其供应链的韧性：一是生产网络重组，涉及投资和撤资决策，跨国企业全球供应链呈现回流、近岸以及多元化的特征；二是跨国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加强其生产网络抵御和吸收冲击的能力。发达国家政府则强化了安全审查等投资限制，以确保疫情期间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或其他与国家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敏感国内资产免受外国收购。中企对海外的产业链拓展受到明显的限制。

疫情影响到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蓝皮书》认为，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国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的下游生产商提供信心和保证，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二是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一些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更多障碍。相较而言，在推进产业链的数字化、资本化过程中，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是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主要影响到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增加。例如，2021 年 3 月，欧盟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在此背景下，一些状况好于最不发达国家，且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例如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额外约束。

相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虽然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暂时从中受益，但是《蓝皮书》分析相关情况后就认为难言乐观，因为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种种迹象表明，某些后发经济体，甚

至是全局意义上劳动力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的后发经济体，其赶超的历史窗口期有可能将逐渐关闭。这个关闭的过程取决于数字化、绿色化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一些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

作者：林畅

来源：《中国贸易报》2021年12月9日第007版

从 2020 年职工平均工资看经济 发展潜力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全国31省份平均工资出炉。从各省平均工资情况来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呈现了稳步提升的良好局面。年鉴的发布涉及每名职工的切身利益，不仅广大职工关心此事，职工亲属等也十分关心。保持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让广大职工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也是稳民心、稳市场、稳预期的重要工作。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抓好，最大限度地提高职工工资。同时，要积极帮助企业，为企业解难题、减负担、降税负，从而让企业能够有条件给职工加薪。如果能够保持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就能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作用，就能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能对就业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基础，形成良性循环。那么，应当如何来看待2020年的职工工资呢？从年鉴中公布的各地平均工作来看，又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从亮点来看，最突出的莫过于私营单位与非私营单位的工资差距在缩小。

透过2020年各省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的工资情况，与2019年相比，非私营单位工资增幅超过1.1的，只有宁夏、上海、青海三个省份，而私营单位工资增幅超过1.1的，则有上海、湖南、青海等11个省份，多出8个省份，说明私营单位与非私营单位之间的工资差距在2020年是缩小的。缩小的原因，不排除是非私营单位控制了工资性支出，取消了福利性工资和报酬。而在私营单位工资中，西藏2020年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超过6万，在全国保持前列，是一个不小的亮点，也是令人振奋的亮点。这也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作用，体现了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农民工工资保持较高的增幅，也说明农民工群体正在告别过去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的局面。就看点而言，过去的一年，无论是非私营单位还是私营单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2020年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列入统计的18个行业中都位列前三，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技术在工资中的影响力在持续扩大。而技术给工资带来的增值效应也在不断提高。真正从事高技术领域工作的群体，工资水平都比较高。而金融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既具有垄断特征，又是一个技术水准比较高、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因此，这些年来，工资水平一直位列前列。而前些年工资水平比较高、一度在行业中排名靠前的房地产业，近年来，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开发商资金链紧绷，尤其在去年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出现了比较大的下降，排名已经靠后了。这也进一步说明，行业景气度对职工工资的影响是非

常大的，新兴行业、热门行业、风口行业的工资水平普遍较高，传统行业则很难成为高工资行业，能够维持现有水平就已经相当不错。

从特点来看，过去的一年，是企业 and 政府都十分困难的一年，也是经济压力很大的一年，更是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而严峻的一年。各地能够保证职工工资继续稳定增长，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知道，疫情对经济、对行业、特别是对企业的冲击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有的企业，为了稳定员工，采用贷款、借钱等方式发放工资，有的老板甚至将私人物品卖掉来给员工发放工资，这确实反映了 2020 年企业是非常艰难的。尽管如此，包括私营单位在内，仍然实现了工资的一定增长，令人赞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企业对职工的关心度在提升，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了，企业对职工的依赖度增强了。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在应对疫情、稳定增长、共渡难关的决心和信心是非常足的，是敢于正视困难、应对困难、战胜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很有韧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九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情况总体正常，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超过预期目标。为什么经济能够超预期增长，与企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与广大职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职工工资的稳定增长，也为消费的稳定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虽然增幅还不是很大，企业困难仍比较大。但是，能够在经济十分困难、企业艰难运行的情况下，把保工资放在突出位置，预示着中国企业是有极强的战斗力和抗风险能力的，中国经济是有很强的潜力的，是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

作者：谭浩俊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2021 年 12 月 13 日第 003 版

量稳质升 外贸创新高

35.39 万亿元人民币——刚刚公布的前 11 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规模已超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克服重重阻力，日均进出口贸易额超 150 亿美元，即 1000 亿元人民币，成绩单很抢眼。临近年末收官的外贸商户们闲不下来，已在琢磨明年市场。尽管风险挑战不断，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稳外贸政策持续发力，中国外贸走稳走实未来可期。

外贸连续 18 个月正增长回顾这一年，中国外贸“持续红”，划出了稳步快速增长的曲线。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8.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2%。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18.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1%。进入下半年，部分外贸品类出口放缓，再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抬高，外界担心中国外贸的好态势能否延续。12 月 7 日，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给出了回答：今年前 11 个月，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4%。自去年 6 月起，中国外贸月度进出口总值已实现连续 18 个月同比正增长！“我们完全有信心实现全年‘量稳质升’目标任务。”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说。这信心，源于中国经济鲜亮厚实的“底色”。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9.8%，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和主要经济体增速，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将超过“6%以上”的预期目标。“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盘牢牢支撑起外贸的平稳运行。”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说。这信心，源于中国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全球疫情蔓延，多个经济体在缓慢复苏过程中对中国商品形成“刚需”。

抓订单、保供应，中国完整而充满活力的工业体系在稳定全球供应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达50.1%，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重回扩张区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价，在全球忙于应对新冠疫情和航运危机之时，中国持续增长的外贸数据有助于缓解全球对经济停滞的焦虑。这信心，源于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的魅力。还没组织好语言，卢旺达咖啡豆、斯里兰卡锡兰红茶等上架就“秒空”——近日，多位外国驻华大使直播带货的火爆场面刷屏。网友们说：“这就是14亿多中国人的购买力！”“秒空”式带货，让世界再次看到中国大市场的无限潜力，也展现着中国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发力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等，积极开拓新市场，外贸发展新动能进一步增强。”赵萍说。迎难而上，勇闯敢试外贸“持续红”，确实不容易。这一年，外贸面临疫情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通胀上升、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等多重风险。外贸商户们也碰到了成本上涨、供应链堵点多等烦心事。

暖心政策为外贸助力。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9101亿元，其中新增减税7889亿元，新增降费1212亿元。“算下来，国家已经给我们免税两年了，今年是第三年。一年免4万多元的税，两年就有近9万元呢。”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店铺老板骆安说，“以前一年租金要20万元左右，现在也就5万多元。因为减免多，我们的收入也上来了，劲头更足了。”万千外贸市场主体勇闯敢试、抢抓机遇。主营户外功能性纺织品面料货物出口的厦门市文泰兴纺织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瑜说，一年来自己公司在跨境电商领域尝到甜头，“过去是出国谈项目，现在‘云’上谈合作、签订单同样方便快捷。”这几个月，一趟趟满载的中欧班列日夜不歇，将中国制造的圣诞用品源源不断送往世界各地。据义乌市圣诞用品行业协会统计，在中欧班列支持下，预计今年圣诞用品销售量同比将增20%以上。优化结构、创新转型，让“持续红”成色更足。细看前11个月外贸出口数据，会发现出口机电产品11.55万亿元，增长21.2%，占出口总值的59%，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增长12.3%，汽车（包括底盘）增长108.4%。

中国外贸竞争力正稳稳地提升。全年精彩，稳健前行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不仅全年量稳质升，还将继续稳健前行。稳外贸政策不停步。最近，呼和浩特提出52条细化措施，优化通关全链条全流程、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云南推出17条举措促进外贸稳增长；辽宁大连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稳外贸的通知》……对外经贸大学海南研究院院长崔凡认为，在精准高效的政策助推下，中国外贸发展环境将持续改善。

外贸展会品牌更响亮。这一年，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三大国家级展会都是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参展商、成交额纷纷创新高。“已经报名下一届！”“明年还要来！”不少境外参展商早早表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上海事务所所长水田贤治感叹：“进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不容错过！”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的贸易伙伴如今遍布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11个月，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5.11万亿元，增长20.6%；欧盟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4.84万亿元，增长20%；中美贸易、中日贸易持续增长，增速分别达21.1%和10.7%……

明年1月1日，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正式生效。这是覆盖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中国已明确，还将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伴随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中国发展了自己，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孔德晨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2月9日第002版